

# 湖州藏书与著述的互动研究<sup>\*</sup>

夏春锦<sup>1</sup>, 赵红娟<sup>2</sup>

(1. 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 浙江 桐乡 314500 2.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 湖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和典籍聚散中心, 不仅藏书文化源远流长, 而且著述繁富。本文立足于藏书, 对湖州丰盛的藏书与繁荣的著述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对内表现为: 学者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 藏书家因藏书而成为学者。对外则表现为: 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 以利于收藏刊刻; 学者借阅湖州藏书而成就自我, 撰写出学术著作。

**关键词:** 湖州; 藏书; 著述; 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G1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388(2008)03-0050-05

## Huzhou Collecting and Writing Books in the Interactive Study

XIA Chun-jin<sup>1</sup>, ZHAO Hong-juan<sup>2</sup>

(1. Tongxiang Model Campus School, Faculty of Humanities, Tongxiang 314500, China;

2.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Huzhou is a place of a galaxy of humanities and the center for collecting and spreading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which has not only a long history of book-collection culture, but also rich in books writing. In this paper, based on books collecting of Huzhou,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have a further study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which is rich in books collecting and prosperous in books writing, to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internal expression of which is that the scholars collected books because of the need of their writing and the books collectors became scholars because of their books collecting, while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which is that the collectors shared their books, which was very helpful to collecting and inscribing so that scholars borrowed book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uzhou to accomplish themselves and write academic works.

**Key words:** Huzhou; books collecting; books writing; interaction

### 一、藏书的兴盛与著述的繁荣

湖州藏书文化发轫于南朝时期的沈约, 至今已有 1 500 多年的历史。据《梁书》沈约本传记载, 沈约“好坟籍, 聚书至二万卷, 京师莫比”。<sup>①</sup>另据《湖录》沈约本传称: “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两处记载虽有出入, 但从《隋书·经籍志》所载宋、齐、梁三代官藏图书最多为七万卷而言, 沈约“京师莫比”的藏书量是非常之可观的, 他无疑是当时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在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后, 湖州藏书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历程。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浙江地区, 宋以前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吴兴地区和杭州, 在浙东则主要在绍兴地区”<sup>[1] [2]</sup>, 吴兴地区出现的许多大藏书家, 其影响波及全国。据王增清先生考察, 湖州历史上的藏书活动经历了四次高潮, 分别集中于两宋、明朝、清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民初四个时期,<sup>[2] (P154-155)</sup> 这在中国地域性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这四次高潮中, 湖州地区涌现出了为数众多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北宋熙

\* 收稿日期: 2008-01-02

作者简介: 夏春锦(1984—), 男, 福建寿宁人, 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教师, 主要从事湖州地方文化研究; 赵红娟(1970—), 女, 浙江义乌人, 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湖州地方文化研究。

① 姚思廉(唐),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 中华书局, 1973。

宁年间的沈思、沈偕父子,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sup>①</sup>南宋的陈振孙年轻时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据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sup>②</sup>其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在国家藏书之上。湖州两宋藏书还必须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叶梦得和周密。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书,逾十万卷,置之雪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sup>③</sup>周密原籍济南,四代客寓吴兴,自述“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sup>④</sup>有“书种”、“志雅”二堂,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

到了元朝,中国整体的藏书状况虽难以与两宋相比,但湖州的赵孟頫确是大藏书家,其所藏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为后世藏家称绝。进入明朝后出现了茅坤“白华楼”,“藏书甲海内,练市新购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sup>⑤</sup>其孙茅元仪编有《九学十部目》,可见藏书范围之广。又沈节甫“薄富贵而厚于书”,有“玩易楼”。姚翼的“玩画斋”藏书也达万卷以上。另外,潘曾紘、臧懋循、徐幼文、朱国桢、凌濛初、董说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学者,这都得益于他们自己丰富的藏书。入清后,湖州藏书楼主要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聚书达十万。严元照的“芳椒堂”也有万卷藏书,且多宋元刊本。许宗彦继承祖上藏书,有“鉴水止斋”于杭州。大学者严可均更是嗜书如命,藏书二万余卷。

清朝中叶以后,湖州藏书达到顶峰。陆心源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楼,藏书达十五万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种,为时所重,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集中在南浔的还有张钧衡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蒋氏四代藏书,其祖上已有“俪簃馆”、“茹古精舍”、“求是斋”、“传书堂”等藏书楼。“密韵楼”中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刘承干的“嘉业堂”更是私家藏书的巨擘,全盛时藏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sup>[3] (P1408)</sup>

湖州藏书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据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在浙江38个府县中,湖州藏书家总数居第三。又据今人范凤书先生统计,在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十个市县中,湖州以总数95家排名第五位,在浙江地区位列第三。<sup>[4] (P679)</sup>

藏书是文人雅事,更是著述的必备条件。对大多数藏书家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读书治学。他们藏书,不仅是对典籍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把所藏之书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编辑编纂之类的著述更是如此。只有收集到众多的图书资料,才能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在湖州藏书家和湖州学者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湖州自古是三吴都会,经济的发达,环境的清丽优雅,孕育和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文人。他们依靠丰盛的藏书,汲取营养,进行广泛深入的著述活动。笔者根据宋慈抱先生所著《两浙著述考》进行了定量统计,浙江全省三国至近代学者著作总量约为11003部,湖州学者著作约为1350部,占浙江全省的比例为12.27%。

湖州学者的著述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囊括了文学、经术、史籍、地志、簿录、武备、医药、天算、艺术、政法、工农等众多领域。各个领域都有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经典之作,如史籍类中沈约的《宋书》,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皆被列入“二十四史”。工农类有陆羽的《茶经》,是茶文化的渊源经典之作。簿录类有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极为精详”,是中国目录学名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出即“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sup>⑥</sup>。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名著经典,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湖州藏书与著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藏书的最为直接和普通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阅读和治学,正如张金吾所说:“藏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学术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对前人成果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只有积累了一定量的藏书,才能为读书治学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学者的著述活动反过来又促进和激化了藏书活动的展开,从而推动藏书风气愈演愈烈。据《两浙著述考》专项统计,清初至民国这段时期湖州著述数量为541部,占湖州著述总数的40%。又清初至民国湖州地区藏书数量达万卷以上者为18家,占湖州有史以来万卷藏书家的60%。从中可看出在这段时期内湖州著述活动与藏书事业都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这种互动关系显得更加突出。

① 清光绪《归安县志》卷五。

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书籍之厄》,中华书局,1983。

③ (宋)王明清,《挥麈录》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④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

⑤ (清)郑元庆,范锴,《吴兴藏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⑥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茅坤传》,中华书局,1974。

## 二、藏书的内部滋润

湖州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他们丰厚藏书的滋润。但要注意的是，他们一个人兼有的这两种身份，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问题。

### (一)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

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渐渐地成长为藏书家。其藏书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学术著述。著述之兴，首先必须有书，但由于古代中国，官府藏书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能够利用官府藏书的人微乎其微，所以就自己收藏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家藏书的出现，主要就是适应学术著述的需要。我们追述肇始湖州藏书风气的沈氏家族，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一特征。沈麟士归隐山中后，开门授徒，藏书不辍。晚年家中遭逢火灾，数千卷典籍化为灰烬，为著述仍毅然抄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sup>①</sup>著有《庄子内篇训》、《五经注》等著作多种。与沈麟士同族而稍后的沈约，早年“好百家之言”，<sup>②</sup>为学出入经、史、子、集之间，以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受到当下学界的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大量的藏书作为前提条件是很难做到的，所撰《宋书》就是在广泛收集和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南朝末年，史学大家姚察也是一位藏书家。虽然藏书的确切数量今已无从查考，但内容大致是“九流《七略》之书，名山石室之记，汲郡、孔堂之书，玉箱金板之文”。这些藏书也是源于著述的需要，他一生笔耕不辍，与儿子姚思廉撰成《梁书》和《陈书》等。明朝茅坤的藏书分“九学十部目”，其中“兵学”藏书与茅坤善用兵、有实战经验有关，并且为茅坤孙茅元仪编撰《武备志》等奠定了基础。“文学”藏书则被茅坤充分利用，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该书规模宏大，体例严密，批评周详。比茅坤稍晚的臧懋循，毕生精力都用在专题收集元杂剧，所编《元曲选》收入了九十四种元人作品和六种明人作品。现存的元人杂剧不过一百五六十种，而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元曲选》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臧懋循编选元曲的目的很明确，即汇集元剧杰作，“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音者知有所取则云耳”。<sup>③</sup>正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他在大量搜集当时散佚在各地的元杂剧基础上，与“家藏秘本”参伍校订，成《

### (二)因藏书而成为学者

这里所论述的藏书家是特指那些专力藏书，

《 》， 《 》56卷

3 096种 51 180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岁起有志藏书

12 450部，16万册，60余万卷。

① 《 》 1985年影印同文书局石印本。

② 《 》 《 》 1973。



